◆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

民主建政和协商民主

——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杰出贡献

□李君如

找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独特革命道路，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过去，在我们研究毛泽东这一伟大贡献的时候，比较多地集中在当年被称为“农村武装割据”的道路上。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课题也应该研究，这就是毛泽东“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因为这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不仅包括创造性地把革命的重点放在农村，而且能够适时地夺取全国政权并创造夺取全国政权的民主形式。

“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是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确实，“农村武装割据”反映了近代中国基本国情的要求。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中国，只有发展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通过广大农民直接参与的土地革命，在农村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农村武装割据”，才能星星之火不断燎原。这是毛泽东创造的一条不同于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道路的独特的革命道路，是最后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过去，在我们研究毛泽东这一贡献的时候，比较多地研究“农村武装割据”的条件和要求以及根据地建设等问题，是正确的。

但是必须指出，这样的研究仅仅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条道路的上半截即“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而没有研究这条道路的下半截即“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完整地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而且包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经典著作系统论述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由国情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论述的重点是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另一篇经典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系统论述的是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道路，我们应该建立的是由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构成的，既不同于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又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尽管这是过渡的形式，但是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为革命而革命，我们的革命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民主政权。

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和国家建设目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毛泽东已经明确提出，共产党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是要夺取全国政权，在全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民主政权。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在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道路的全部经验，可分两大部分：一是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二是在敌强我弱态势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适时地把工作重点转向进城，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独特的革命道路，不仅包括他创造性地把革命的重点放在农村，实行“农村武装割据”的思想，而且包括他关于适时夺取全国政权和夺取全国政权的民主形式等非常重要的思想。

民主建政是“夺取全国政权”的基本要求

对毛泽东“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西方有些人歪曲他提出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污蔑我们是依靠枪杆子支撑的极权制度。他们完全不懂得，中国共产党拿起枪杆子，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手中不仅拿着枪杆子，还用这个枪杆子屠杀人民。我在国外的一次演讲中曾经回答过这一问题。

“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话确实是我们说过的，时间是 1927 年 8 月 7 日。为什么要说这个时间呢？因为在这之前，1927 年 4 月 12 日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国民党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这件事情迫使共产党人在那年 8 月 1 日拿起了枪杆子，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也就是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严酷的形势迫使我们作出的决定，并非共产党人迷恋暴力。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民主力量的代表，作为一个长期为民主而奋斗的党，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时候并没有凭借枪杆子的力量独霸政权，而是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采取民主的方式，共同来建立新中国。

可以这样说，毛泽东的“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就是武装推翻旧政权、民主建立新政权的思想。

人们熟知的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话，讲的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民主新路”。当年，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有何感想？黄炎培坦然答道：“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是这样说，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需要注意的是，他提出的“民主新路”，是“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最大多数人的民主，不是一部分人的民主，更不是少数人的民主。或者说，这种民主不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不是名义上人人都有一票而实际上有许多限制并非人人都能够享有的民主。这是一种全新的民主，是毛泽东所说的人民民主。

在党的七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曾经设想建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作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形式。可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国民党就发动了不得人心的内战。但由于这场内战逆历史潮流而动，到 1947 年秋，人民解放军已经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掌握了主动权，加上我们党在根据地实行土地改革，在国统区领导人民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全国范围内的人心所向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我们党的根本变化。这意味着，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到来了。党中央决定夺取全国政权，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在这个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时刻，有一件事是值得重视的，毛泽东十分警惕在党内出现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狭隘口号，及时提出要同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的各个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通过广泛的民主形式、民主的途径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所以，我们说毛泽东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中所强调的“夺取全国政权”思想，是武装推翻旧政权、民主建立新政权的思想。民主建政是“夺取全国政权”的基本要求。

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独创的民主建政形式

我们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民主建政”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毛泽东提出的“人人起来负责”的新型民主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实现的。

研究毛泽东的民主建政思想，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决定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时刻，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明确地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 年 4 月 30 日，在中共中央发表的“五一口号”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里，明确提出了由民主统一战线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就是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把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转化为有组织、有章程、有制度的统一战线；然后，决定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条件还不具备的条件下，由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权。这种民主，在民主政治的分类中属于“协商民主”。也就是说，毛泽东关于“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在“武装推翻旧政权、民主建立新政权”的思想中，还包括了通过协商民主建立新中国的特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民主建立新中国的经验概括为“民主建政，协商建国”。

这一历史过程所体现的毛泽东民主建政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依靠和发挥我们在革命实践中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把非制度化的统一战线转化为制度化的统一战线，即在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过程中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再把制度化的统一战线转化为人民民主的政权组织，即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组织机构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国家权力机关职权。

总之，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独特的革命道路，由“农村包围城市”和“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两个方面的思想组成。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又包括了“武装推翻旧政权、民主建立新政权”的思想。在“民主建立新政权”的思想中，提出并实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只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思想讲全了，才能真正说明这条道路对中国革命胜利无比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在这篇论文结束之际，还要提醒大家：新中国成立后，在经过普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完成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之际，毛泽东意识到人大的代表性尽管很大，但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决定在召开全国人大后继续保留人民政协，以实现我们党“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梦想。这样，就形成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两种民主形式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新型的民主形式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党中央在 2006 年明确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作出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具体部署。历史的回顾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来源于毛泽东开辟的独特的革命道路，创造性地开创的“民主新路”和实行的新型民主。这也是我为什么在今天，要以这篇论文来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的原因。

毛泽东谈百年目标与制度改革

□倪德刚

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会要一百年

1962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时间。”“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50 多年前，毛泽东提出百年目标的根据有以下几点。

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毛泽东说：“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人家建成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三百多年，我们才十几年，不能急。“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国国情。毛泽东讲了两点国情，一个是优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另一个是劣势，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

缺乏经验。毛泽东说：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知识，缺乏经验，就算有一点，也还不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毛泽东举例子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

在实现百年目标进程中，要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1962 年，毛泽东对未来 50 年到 100 年的世界变化作出了准确的总判断。他说：“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一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毛泽东这段话，含义深刻，从世界社会制度彻底变化角度看，毛泽东讲 50 年左右世界社会制度处于翻天覆地大变动。其实没到 50 年，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彻底变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形成了。

制度改革是根本

有人说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只有探索，不讲改革，笔者持不同观点。1958 年 9 月 5 日，毛泽东说：“搞八年没有摸到一条路，不会搞。也是因为制度没有改革。”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前，讲“制度改革”是非常深刻的。

只不过毛泽东制度改革的思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不一样罢了。他改革的思路是从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改起，然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63 年 12 月 16 日，毛泽东在同聂荣臻谈话时说：“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解决之后，那么，怎样具体发展生产力呢？他强调：“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改革上层建筑，解放生产力；搞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这就是毛泽东的改革思路。

那么，毛泽东既然知道了“没摸到路”和“没搞好”的原因在于“制度没有改革”，为什么他不从所有制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入手，进行大胆改革呢？其实，毛泽东有一个最担心的后果。1962 年 1 月 30 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这种担心，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局限性吧。

毛泽东所讲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原则在经济上的体现，就是说我们搞经济建设必须始终体现社会主义这个根本，丢了社会主义，只顾经济发展就会“变质”。若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经济之间加上“市场”二字，就是现在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便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是社会主义原则在市场经济中的充分展示。否则，就没有必要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

邓小平多次指出：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他晚年特别强调：“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战’。”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定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既要牢记毛泽东“制度改革”的远见，把“上层建筑”真正改好；也要看到其历史局限性，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从而更加坚定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征程中，让社会主义大放光彩，让中国特色更精彩。

◆新时期论坛

调查研究方式需改进

□万 军

当前，各地在深入查摆“四风”问题、对照检查中往往都有这样一条：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领导干部感慨，虽然也经常下基层调研，但多是浮在面上听听汇报，走马观花看看“盆景”，接触的也多是基层党政干部和先进典型，和普通群众拉家常、说心里话的机会比较少。再加上随行车队声势浩大、“长枪短炮”林立，不要说现场的群众说不出话来，就连自己也常常在镁光灯下忘记了调研的目的，陷入到程式化的接见群众套路之中去了。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各地在整改中都专门对加强到基层调研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办法。如有的地方搞“调研周”，规定每月安排一周的时间集中到基层调研；有的地方规定，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必须撰写调研报告，必须解决一定的实际问题，成果还要统计上报，等等。不少制度办法出台的初衷很好，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如果不注意从实际出发，过于注重形式上的统一、数字上的好看，很容易导致调研的扎堆化、表面化，看似扎扎实实、热热闹闹，实际上很容易加重基层的负担，成为新的形式主义，背离了加强调研工作的初衷。

调研的目的是及时掌握基层的最新变化、一手资料，深入、唯实是其核心要求，具体做法都是手段。今天，尽管我们深入基层、掌握实情的目标没有变，但是时代变了、环境变了，群众的构成也变了，要求我们下基层调研的方式方法也应该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才能使调查研究不走形式、取得实效。

多搞“小分队”，少搞“大部队”。调研中最怕的就是“一窝蜂”“大呼隆”，浩浩荡荡，大队人马，人未到，声已闻。这样的调研往往热闹有余、成效不足、劳而无功。应该提倡轻车简从，组成精干的小分队，尽量不惊动媒体，减少地方陪同，一竿子插到群众中间，用行动消除距离，用脚步丈量民情，这样容易听到真话、查到实情。

多搞“蹲点式”，少搞“蜻蜓式”。浮光掠影、蜻蜓点水，满足于来过了、看到了，迷迷糊糊、一知半解，是调研工作的大忌。最好的调研是围绕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棘手难题，组成精干的小分队，到有代表性的地方去蹲上十天一月，真正把情况摸清楚，在解剖“麻雀”中和群众一起探讨破解之道，这是最容易出成果的调研方式。

多搞“嵌入式”，少搞“两张皮”。就是把调研有机地嵌入工作之中，而不是机械地在日常工作之外再安排调研。调研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推动工作，除了到基层之外，采取召开座谈会、发征求意见函、个别沟通等方式，及时征求各方面对相关问题的意见建议，这本身也是调查研究的一种有效形式。

多搞“借力式”，少搞“单一式”。当前，各个单位都重视调研，都制定了详细的调研计划。但往往基层有代表性的点是有限的，许多调研难免交叉重复。要从实际效果出发，对于别人已经去过、调研过，已经有了很成熟的调研成果的地方，就可以不去或少去。多学习、借鉴别人的前期成果，这样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再比如人大政协的时间比较宽裕，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研究比较系统，党委政府完全可以多倚重、多借鉴他们的调研成果，直接为决策服务。

其实，领导干部本身也来自群众、生活在群众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我们放下架子、走出圈子、迈开步子，生活中时时处处都可以做调研。调研不仅是一种工作手段，更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要了解困难群众生活，不一定要深入山区农村，在一些大中城市光鲜亮丽的繁华街区背后，就有低矮拥挤的平房区、胡同区，一些地方的城乡结合部环境脏乱、管理混乱，大量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普通群众就蜗居在这里，只要到这些地方走一走、看一看、聊一聊就十分明了。要了解交通拥堵，不妨自己挤挤地铁、坐坐公交，和出租车司机侃侃大山；要了解看病难、看病贵，不妨自己排排队挂个号；平时多和老家的亲戚、儿时的玩伴、大学的同学联系联系，往往能听到开会难得听到的刺耳真话。这种生活式的调研，真实自然，一样可以掌握许多宝贵的一手资料。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它是反映干部工作水平的“温度计”，也是检验干部宗旨意识的“试金石”。只有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只下真功夫，不搞花架子，才能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歪风，真正加强与改进调查研究工作，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奠定坚实基础。